

改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

郭熙保 韩纪江

新观察

我国经历了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具体体现在需求结构、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扭转结构失衡状况,让国民经济保持协调、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今后若干年必须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们认为关键是要改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

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推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近10%,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依靠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来推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在经济实现起飞之后和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这种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就难以继续,必须适时转换。否则,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就不可能达到。

在需求结构上,高投资必然会相应地降低消费。在2001年至2010年间,投资率从36.5%上升到48.6%,而消费率相应地从61%下降到47%,其中居民消费从45.3%下降到33.8%。消费的萎缩造成内需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外需来维持较高的总需求,结果是越来越依赖出口来维持高速增长。外向型经济对国际经济形势非常敏感,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和萧条,就会导致出口下滑,经济增长减速。

在投入结构上,高投资导致资本投资效率下降。首先,高投资使得总量生产率难以提高。投入由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要素构成。技术进步是提高总量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由于资本投入比例高,促进技术进步的创新就比较薄弱,因为企业能够依靠高投资获得高额利润,就没有动力去追求创新和变革。其次,高投资导致资源消耗过快,环境不断恶化。

在产业结构上,高投资导致我国产业结构越来越重工业化。我国大部分投资倾向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基础设施,而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相对较少,结果是工业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近10年来重工业比重上升较快,重工业比重从上个世纪末的50%上升到目前的70%,而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则相对滞后。由于工业部门发展越来越重工业化,造成了重工业部

门产品积压、产能过剩。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是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必须把改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作为主要着力点。一要扭转GDP崇拜的社会氛围,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二要深化体制改革。首先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理顺价格体系,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其价格。其次是加快财税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通过财税政策对收入的调节功能,让低收入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让高收入者上缴更多的税收;以财政为后盾建立和完善城乡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三要通过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投资。要改变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就要下决心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投资和过度干预,让发展型政府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热点透析

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任务抓实抓好,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还能推进城乡一体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一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三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速度快于小城市(镇)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速度。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忽视了城镇化发展在时间上的推进节奏,在空间上的合理均衡布局。因此,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实际上是生产空间布局与人口空间布局相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与人口战略布局相协调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它体现了人口与城镇建设、人口与经济发展在空间、时序上的均衡与协调。客观上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支撑。城镇体系布局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完善,必然影响着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和产业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有序转移的水平与质量。按照适度、合理布局、特色鲜明和功能互补的原则,着力构建和完善包括省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在内的五级城镇体系,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有序转移的重要条件。二是结构优化质量较高的产业体系。产业支撑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关键。规模小、专业化与产业化程度较低的第一产业必然会聚集大量富余劳动力;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有限;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发展速度偏慢、发展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也抑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必须要构建起能够支撑“两型”社会建设、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和人口有序转移的结构优化、质量较高的新型产业体系。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依照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有规划、有节奏、有重点地推进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有序转移,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加快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是按照区域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科学合理引导人口有序转移。一方面,采取积极政策措施,着力推动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富余地区的人口,向城市群、大中城市适度集中和集聚;另一方面,把县城、中心镇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人口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着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强化产业支撑,不断提高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承载吸纳能力,实现农村人口的就近转移就业。同时,要因地利宜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稳步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实现农村人口集中居住、集聚发展。

二是给予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完全的市民化待遇。要秉持分类指导、平稳有序的理念,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给予落户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化待遇,使其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并尽快融入城市。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农村居民的退出机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工家庭的土地财产收益,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累资金成本。

三是重点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积极鼓励中小城市在土地、户籍、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试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积极创造条件,促使重大项目 and 重要产业的产业链从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并通过主导产业的培育来带动相关配套领域、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着力实施中小城市城镇功能提升计划,全面加强中小城市道路、通信网络、给排水、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中小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

四是依托区域产业集群鼓励农村居民就近就地非农化就业。充分发挥区域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区域产业集群工作就业。在传统农业规划和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工业园和工业小区,推进乡镇企业向园区集中、集聚,促进农村人口就近转移和就地就业。对进入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园区就业的转移农民进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其就业能力。

(执笔:喻新安 王建国 王新涛)

本版编辑 裴珍珍

邮箱:peizz@ced.com.cn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新变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方 霄

前瞻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重要一员,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已经成为许多重大全球问题的关键因素。如何根据世界经济格局和自身地位的变化,更好地适应和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未来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低迷。而新兴经济体则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随着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新兴经济体必然会要求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调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崛起首先是群体性崛起,有大批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快速增长。2001年至2008年,有106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有73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有47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

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面临着新机遇。

一是综合国力的上升,奠定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并迅速成长为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从2007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准确判断国际地位,树立正确心态。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需要树立正确的心态。过去我们一直有一种弱心态,即认为自身实力很弱,对国际事务没影响,因此不愿意有所作为。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力量对比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许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许多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根本无法解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树立新兴大国的自信心态,摆脱过去那种追随者心态,即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较少发挥主动作用的心态。如今,中国应该采取更加主动的行动,不能坐等别的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

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更表现在新兴大国的崛起。经济总量最大的10个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24.2%,上升了10.1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前10大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4.6%,相当于同期整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68.5%。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新兴经济体之间相互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

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制造业出口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形成了相互贸易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不断持续下去。因此,即使我们判断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新兴经济体仍可以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在2020年之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现有的全球经济机制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之上,是西方主导、大国协调与多边协调并存的局面。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地位的不断上升,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必然对现有全球

经济治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和内容两个方面。从机制方面来看,现有的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改革,这一点不仅是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共识。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没有充分反映当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重要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与日俱增,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必须让新兴经济体参与。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数目众多,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规模上存在差异,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形成合力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来看,过去在西方的主导下,更多的是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即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贸易、投资和金融全球化。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全球经

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在国内,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和历史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国际秩序调整的契机,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实现自身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西方国家固然想遏制,但力有未逮,不得不开始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些都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面临的机遇

别是能源和资源出口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综合国力的上升,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要想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做后盾。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重大的全球经济治理议题没有

中国的参与都难以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只要中国主观上愿意,是完全可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是西方实力的衰落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其经济表现不佳、债务问题严

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选择

运。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主动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也在上升。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应该增强在全球治理中主动提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我们可以作倡议者、发起者、组织者、先行者。

二是主动开放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中国成为过去30多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努力,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未来,中国要为和平发展塑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更加主动地让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要

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二要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稳固地区和双边关系。三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不仅要扩大援助

的金额,也要扩大援助的范围,创新援助的形式,除了资金援助,还要重视技术、项目、人力资本的援助。

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好对外宣传。总体而言,中国在经济等硬实力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软实力建设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软实力如果运用得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要加大对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国际问题领域的研究投入,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储备,对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如气候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哈回合

谈判等提出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和中国自身的行动方案。

要改对外宣传为对外公关,实施中国国家形象公关战略,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就、对世界的贡献、对未来世界和人类发展的思考等等。

要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问题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在各行各业培养和引进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具备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的专业人才,形成一批在国际问题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家和活动家。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姜明——

积极打造科技商品化平台

理论动态

本报讯 记者马志刚报道:在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商业科技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姜明对当前经济转型的迫切形势进行了深入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打造科技商品化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对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姜明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基本上依靠粗放要素投入,即“资本+土地+人工”。但从去年经济发展的情

况看,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外需萎缩状况短期难以改善,继续依靠传统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越来越难了,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必须加快转型,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依靠科技的引领作用。

姜明告诉记者,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用200多年的时间创造巨大财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科技的运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中央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5年累计达8729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8%,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由2007年的1.4%提高到2012年的1.97%,企业研发活动支出占比超过74%,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达到8000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8%。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看到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商品、形成生产力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仅为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根据瑞士洛桑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科技实力评价进行的综合研究结果,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居中游水平,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还有很大差距。

姜明说,现在科研条块分割,与市场脱节,是导致科技经济两张皮并阻碍科技水平提高的主要“拦路虎”。产学研要实现无缝对接,还缺少“平台”和“通道”。

据姜明介绍,此次中国商业联合会同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商业科技博览会”,就是要为我国从事产品生产、加工、商贸、物流、服务、科研、教育等领域的企业提供一个技术与信息、资源与市场的集中式展览、展示、交易窗口;提供一个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集合化成果转化平台;同时为企业在科技研发、创新、新技术应用与商业化推广方面建立国际化协作机制。